

# 译学研究中的理论话题:发展动态与当下两对主要矛盾\*

谭载喜

(香港浸会大学,香港)

中国当代译学研究,其较大发展如以1987年7月于青岛召开的首届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为起始标志,至今已近四十年。本人曾于2012年第4期《中国翻译》刊出的一篇笔谈中,对那次深具开创意义的全国译学研讨会作了一点回忆:笔者当年有幸应邀与刘宓庆先生分别在会议第一天作大会发言,笔者的发言题目是“关于建立翻译学”,主要讨论把翻译学作为独立科学学科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发言内容先后在《中国翻译》(1987年第3期)与《外国语》(1988年第3期)刊出;刘宓庆先生则侧重讨论翻译研究的中国特色问题。这些问题以及与会代表在会上提出的许多其它问题,包括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要不要建立与如何建立翻译学、翻译学的学科性质、翻译学的民族特色、要不要引进以及如何引进外国翻译理论等方面的问题,不仅当时在会议期间引发热议,而且后来在许多其它场所(包括会议和期刊著述中)也不断被提出、被讨论。可以说,所有这些问题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了当代中国译学研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一些理论话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正因为此类理论话题的提出,正因为翻译理论研究者对这些话题的广泛关注和研究投入,才推动了当代中国译学的大步向前发展。

大步发展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其一,就是经过多年的争议和探讨之后,我们在一些较根本的理论问题上获得了较多的共识。例如,对“翻译学”的学科建立和发展问题,虽然我们在其名称和学科性质上至今可能仍有不同见解,但学界的主流认识是一致的,就是:翻译研究应被当作一门独立的跨界人文科学学科来发展,而且事实上已经如此或基本如此。其二,是对一些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如“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之类的问题,我们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就是不再纠缠其中的孰是孰非。其三,是对中国传统译论或译学话语的挖掘和重释,这种由现代译学意识驱动而形成的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热,使我们增强了对“自成体系”的中国传统译论的认识,同时也为发展“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主张构筑出新的理论话题,包括翻译中的“和谐论”(郑海凌)、国人应引以为豪的“中国翻译美学”(刘宓庆)、能与西方译论分庭抗礼的“中国翻译话语”(张佩瑶)等等。其四,是对译学领域的“他者”(主要是西方)思想的大规模开放和引进。虽然在要不要引进和如何引进的问题上至今存在不同声音,包括不甚赞成以及反对的声音(下面再议),但近四十年来我们对于外来译学思想的引进,从翻译介绍到购买版权出版原版丛书,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当代异域理论话题的引进因此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许多话题至今仍可包括在我们的关注范围之内,如奈达的“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纽马克的“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卡特福德的“翻译语言学论”、霍姆斯的“翻译研究系统论”、伊文·佐哈的“翻译与多元系统论”、图里的“翻译描写论”、弗米尔和赖斯的“翻译目的论”、勒弗维尔等人的“翻译诗学”、“翻译操纵论”、“翻译赞助论”、“翻译

\* 本文为作者在《外国语》编辑部举办的“全国翻译理论研究高层论坛”(2014年1月19日)上的发言内容,经作者本人整理成文。

规范论”、“翻译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论”,以及形形色色的其它理论和话题,如源自19世纪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的“归化与异化论”、模仿“生物基因”而来的“翻译模因论”(translation memes)和反映特定社会、政治思潮的所谓“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译者身份论”等等。另外,除了以上提到的四个主要类别,重要的理论话题还包括翻译教育、翻译教学、翻译职业培训、机器翻译以及互联网“本地化”等领域的话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译学研究,前前后后也正是围绕这些话题而展开的。

无疑,近四十年来我国译学研究事业的大步发展,既依靠理论话题的引领,同时又反过来推动理论话题的不断创新和不断充实。然而,正如笔者曾经谈到过的,就总体而言,发展至今,我们在译学研究的道路上还仍然谈不上已经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在很多方面,尤其在对现有译学话题的认知广度和深度以及在如何开创和发展新的译学话题层面,我们与他者之间还存在差距,发展的空间还仍然巨大。如何缩小差距?如何加大向前发展的步伐?如何让我们的译学思想和主张真正踏入世界、参与世界译学对话,并最终跻身世界译学发展的最前列?这些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笔者认为,就当前情况而言,我们在译学研究上有两对矛盾或曰两大关系需要首先处理,才能回答好上述问题。第一对矛盾,是翻译思想和理论上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矛盾,主要涉及中国学者应当如何看待来自异域尤其是西方的译学思想和理论。这是一对老矛盾,但它至今仍在困惑我们。如前所述,在过去四十来年中,伴随着西方各种译论与思想的介绍与引进,国内译学领域始终存在一些排斥甚至反对的声音,只是到了今时今日这种声音已变得不那么直接了。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声音,就是主张我们的译学研究应当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这个口号听来十分“爱国”,也无可非议。但细加分析,却不难发现其背后的意义是狭隘的,因为它以狭隘的眼光看待译学本质,并将中外思想人为地对立起来。笔者的一贯观点是,从某种意义上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的确是存在的。但它的存在,不应作为刻意计划、刻意规定或刻意按照自我主观愿望去追求的目标。译学研究毕竟不同于翻译本身:翻译本身是技术也是艺术,译者当然可以并且也需要以突出自己在翻译再创作过程中的个人特色为目标;但在译学研究中,我们的目标是找寻最能说明翻译本质、最能阐释和解决翻译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而不应为研究而研究、为特色而研究。自然,不论中国或外国研究者,却又都会因为自身的民族、思想或语言文化等方面特性,其提出的思想和理论会或多或少打上自己或自己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烙印。换言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它必然是、也只能是译学研究的结果。而如果把它人为地定为追求的目标,所产生的结果就会是人为的、是不真确的、也是不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因此笔者倡导:在我们的译学研究中,要淡化或弱化谁跟谁(中国跟西方或西方跟中国)走的概念,不人为地去追逐要让自己不同于他者,而是立足自我,跟着自己的认知和思维走,对于某个特定的思想和理论,如果自己认为它有用,认为它解释到了翻译问题、能解决翻译问题,就不必首先斤斤计较于该思想或理论是自己的还是来自他者的,只要首先追逐的是真理,目标正确,并朝着目标不懈努力,那么这个自己也就一定会发展出令他者仰望的理论来。

第二对矛盾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译学研究中可能出现的新旧理论话题的矛盾。例如,由于译学研究中所谓“文化转向”思潮的影响,并且也由于语言翻译的确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近些年来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一些有关基于语言的翻译定义如何已经过时、如何应当运用文化视角去重新定义翻译的呼声。究竟是基于语言的翻译定义过了时,还是以文化为主的诠释观念过于“前卫”?这就是矛盾。笔者认为,要处理这样的矛盾,我们需要首先确立能为矛盾双方所接受共同阐释原则。例如,在诠释翻译的属性时,必须首先申明被诠释对象的范围所指,如首先说明所

诠释的究竟是“语际翻译”、“语内翻译”,还是“符际翻译”(即“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翻译”)的问题。如果诠释对象是语际或语内翻译,那自然就要侧重于语言本身;如果是诠释符际翻译,那完全可以“文化翻译”的方式来诠释,因为“符际翻译”所指范围很广,既包括语言与非语言之间的翻译,也可指非语言符号(如音乐与图画等等)彼此之间的翻译。当然,我们同时也需要指出,即使是诠释涉及语言的翻译,尤其是语际翻译,译者也需要有文化意识,需要充分考虑跨语文本生成过程中的文化元素,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对于任何被生成的目标文本,都可能进行文化、政治甚或意识形态层面的阐释和解读。但从根本上看,语际翻译既然是涉及语言的翻译,因此就不能不突出语言这个核心,过分强调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而冲淡甚至丢弃语言这个根本因素,是不可取的。

除上述两对矛盾外,当然可能还有其它矛盾存在。例如,尤其是在有机构(如各级译协、各类期刊、各类项目基金或资助单位等等)参与或组织的译学研究工作中,可能存在以何种方式来确立理论话题的问题:过多的课题规划可能会束缚研究者的创造性,毫无计划、组织或指引的自由选择却又可能捕捉不到重点或形成不了影响力,如此等等。总之,译学研究有如其它研究领域一样,各种矛盾始终存在,而这些矛盾既由代表着各种不同思想的话语、话题产生,又会通过它所激发和碰撞出的火花而生成新的话题和新的思想。译学研究正是在这种不断解决矛盾,不断生成新的理论话题,并对这些话题展开研究的过程中,而不断向前迈进。

---

## “外教社博学文库”征稿启事

为及时反映我国英语学术研究的发展现状,展示各个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和成果,支持鼓励和扶植优秀的英语博士人才,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将继续遴选优秀英语语言文学博士论文,纳入“外教社博学文库”出版。

本文库征集书稿条件和要求如下:

- 1) 书稿应为作者的博士毕业论文(中英文皆可),论文须有创新点;
- 2) 论文完成时间在2000年1月1日—2014年6月30日期间;
- 3) 论文附有三位或以上博导(校内一位、校外二位)的推荐信;
- 4) 作者在2014年以前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主题的论文不少于2篇,请提供论文复印件;
- 5) 作者请从网上下载并填写投稿及推荐表格(<http://www.sflep.com>),同时提交论文影印本二份(论文中不出现作者姓名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本次征稿的截止日期为2014年12月31日。外教社将邀请专家匿名评审,遴选其中优秀论文出版。遴选结果将于2015年9月左右通知各位投稿者,入选论文拟于2016年内出版。投稿请寄:上海市虹口区大连西路558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学术事业部 收 邮编:200083。